

文学史研究丛书

鲁迅《故乡》阅读史  
——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

〔日〕藤井省三 著 董炳月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 [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

(文学史研究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301-04780-0

. 鲁... . 藤... 董... . 鲁迅小说-文学研究  
.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27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1-3138

书 名: 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

著作责任者: [日]藤井省三 著 董炳月 译

责任编辑: 张凤珠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780-0 I·05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6.875 印张 20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目 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1)
译者说明.....	(3)
中文版序.....	(5)
引言:文学与“想象的共同体” .....	(9)
第一章 知识阶级的《故乡》 ——中华民国时期(上) .....	(1)
一 文本的诞生 ——1921年对契里珂夫作品的翻译 .....	(1)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兴读者层.....	(6)
三 爱罗先珂的知识阶级批判 .....	(13)
四 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杂志的机能 .....	(19)
五 书店网的扩大与《呐喊》的传播 .....	(25)
第二章 教科书中的《故乡》 ——中华民国时期(下) .....	(32)
一 “国文科”制度 .....	(32)
二 国语教科书的历史 .....	(36)
三 国语教学中的《故乡》 .....	(44)

四	“事实的文学”与“情感的文学” ——作为再生产的批评 .....	(54)
第三章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毛泽东时代.....	(71)
一	新圣人与“惟人民独尊” .....	(71)
二	“语文科”的诞生与思想政治教育 .....	(78)
三	“豆腐西施”的阶级性 .....	(89)
四	谁是小偷 .....	(96)
五	被“文革”放逐的《故乡》 .....	(105)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邓小平时代 .....	(110)
一	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与“文道论争” .....	(110)
二	为“豆腐西施”平反 .....	(115)
三	“闰土 = 小偷”观点的复活 .....	(124)
四	关于“我”的插图 .....	(128)
五	主题思想的复古与革新 .....	(134)
六	在上海市某中学的语文课堂上 .....	(142)
结语	走向“历史悬案”的彼岸 .....	(154)
后记	.....	(163)
文本与文学史(代译后记)	.....	(167)
史料索引	.....	(174)

##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

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 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 译者说明

- 一 本书据日本创文社 1997 年 11 月版《鲁迅 故郷 の 书史——近代中国の文学空间》译出。从译文读者对象的角度考虑,征得著者的同意,删除了原著书后所附《故乡 关系年表》和《人名·团体名索引》。
- 二 原著注释为尾注,列于全书正文之后。为便于读者阅读,译本均改为脚注。未注明“译注”者皆为原注。
- 三 原著翻译、引用了大量中文资料。译本在将其还原为中文时,为照顾引文的完整性恢复了引文中个别太短的省略部分。原著中个别人名或日期的笔误或误植亦做了订正。这些均征得了著者的同意,未一一注明。
- 四 《史料索引》中有关语文教材出版地、版次、印数的内容太多,译稿做了部分删节。

## 中文版序

我是在 1976 年 4 月升入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系研究生班。在听恩师丸山升先生、伊藤虎丸先生专题讲座的过程中,我的兴趣渐渐集中到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是怎样被本世纪初叶逃亡或留学到东京的章太炎、鲁迅、苏曼殊等人接受的这一问题。当时我认为,清末中国最大的课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文学则是被作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原动力创造出来。

两年之后,我提交了题为《个体与民族》的硕士论文,升入博士课程。1979 年 9 月我作为第一届日中两国交换留学生的一员去中国,在北京、上海生活了一年。留学期间得以拜访周海婴先生、单演义教授、朱正先生、陈漱渝教授、胡从经博士、王自立教授诸位,得到指教,并得以结识当时还是研究生或助教的钱理群教授、陈福康教授、陈子善教授、陈建华教授诸位。

回国两年之后我到东京大学中文系当助教,一边管理一个叫做“汉籍中心”的图书室,一边对夏目漱石和鲁迅在同一时期的东京对俄国作家安德烈夫的接受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三年后该研究被整理成《俄国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一书,我本人也到由曾经是鲁迅朋友的牧师清水安三先生创立的樱美林大学的中文系担任副教授。在该

校任教期间,发表在《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学》等学术刊物上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中国对拜伦的接受》、《鲁迅、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学》与论述20年代鲁迅对契里珂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国作家接受的论文一起,编为《鲁迅——故乡的风景》一书得以出版。

1988年我到东京大学文学部担任副教授,开始对曾经给予鲁迅以深刻影响、足迹遍及20世纪初叶之东亚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感兴趣,对警察所、中国日本领事馆的秘密文件进行了查阅,第二年出版了《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二十年代的东京、上海与北京》,1992年又出版了《东京外语支那语部》。该书是以战前通过汉语教学最早、最广泛地介绍同时代中国文学的东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教研室的教师和毕业生为研究对象。不言而喻,鲁迅也曾经密切关注这个“东京外语小组”。

与此同时,由于在学校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我不仅研究民国时期的鲁迅以及相关的中国作家,也阅读了张恨水、张爱玲、赵树理等大众文学作家的作品、40年代的文学作品以及《人民文学》的作品,惊讶于这些作品的丰富与成熟。此外,从80年代末开始,我对那时刚出现不久的以寻根文学为中心的中国同时代文学也非常关心。

这样,从《东京外语支那语部》脱稿的1991年末开始,我投入了《新中国文学史》后半部分“近现代编”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我的目标不是把文学史写成对作家作品的解说,而是从社会史的视点进行叙述:他、她或者他们,在当时的时代是怎样识字、怎样学习文章作法、怎样与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品群相遇并进而创造出自己的表现手法?其作品是怎样被记录、印刷,怎样传达给读者的?还有,读者是怎样将其在先锋性作品群中定位的?批评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而且,从获得这种阅读体验的读者层当中,涌现出来的是怎样的新作者、新作品?

……

该书就是不停地探讨着类似的问题,考察了从当时的社会文化程度到印刷技术、出版制度,以及从书刊的流通体制乃至文化人的交际圈到教育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还注意到了对与作品和读者层相交锋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即从作者被生产、其作品得以流通、作者被读

者消费的全过程中,把文学史作为批评和新作品再生产的过程来叙述。书名《新中国文学史》所谓的“新”,就是基于这种社会史式写作的尝试。该书1993年已经基本定稿,但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出版时间居然比交稿时间晚了四年。

通过写作《新中国文学史》,我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做了总体考察,把这种社会史的视角归结为“阅读史”的方法。通过分析中国人对鲁迅文学作品的阅读方法,追寻这一阅读史,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社会式的考察不是可能的吗?如果确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论述的,出版资本主义促使人们进行着国民国家的“想象”,那么以对鲁迅的阅读历史为切入口,不是可以描绘出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的建设过程中文学所扮演的神秘角色吗?——当时我这样想。但如果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鲁迅文学”是怎样被阅读的,那实在是我难以胜任的,因此我把研究对象限定在鲁迅的代表作之一、长期以来被许多中学教材收录的短篇小说《故乡》上。

这样,《鲁迅 故乡 阅读史》成为我二十年间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终点,同时它又是我通过与中国和中国朋友的长期对话所理解的20世纪中国。即使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为本书由于被译为中文而能够被中国朋友和读者以及其他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朋友阅读,并能够因此得到他们的教示而感到十分高兴。

我要对为本书中文译本的出版竭尽全力的陈平原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我还要对结束近五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刚刚回国、来不及休息就投入本书翻译工作的董炳月博士表示感谢。董炳月君1998年以对周作人和武者小路实笃做比较研究的论文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敏锐、颇有前途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日语也熟练,他的翻译会非常完美。

藤井省三

2000年4月5日于东京·本乡

## 引言：文学与“想象的共同体”

本世纪 20 年代初，在中华民国首都北平，综合性刊物《新青年》月刊发表了鲁迅的一篇叙述回乡故事的作品。那就是短篇名作《故乡》。

这篇小说的出现不仅标志着鲁迅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成熟期，而且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化。这样说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清末以来欧化、产业化发展，教育、文化方面各种制度的原型基本形成，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体制已经确立。以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现代化，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女大学生的出现，都推动着以这些新兴知识阶层为作者、读者、编辑出版者的新闻出版业的迅猛发展。

文体也向言文一致的方向发生迅速转变。经过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用白话文编纂的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出现，讲授文言文作品的“国文科”也被使用白话文教材的“国语科”取代。——这也是发生在 20 年代初的事。

《故乡》是在发表两年后被收入单行本《呐喊》并引起广泛讨论的，而中学国语教科书比单行本更早将《故乡》作为教材收入，以此培养知识阶级后备军的感情与逻辑。1949 年共产党统一中国

之后,《故乡》又被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被作为承担着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语文教材向中学生讲授。

在《故乡》发表至今的七十余年间,接触过这篇作品的读者大约多达十几亿。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民国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教科书编者和国语教师对作品做出了解释,进入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文化行政官员强化了对作品的解释。无论是服膺于诸种诱导还是与其对立,读者都是从自身所处的时代状况出发对作品进行新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故乡》称作被不断改写、不断更新的文本。

《故乡》诞生的20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人们力图打破军阀割据与日本、欧美的侵略造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将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故乡》虽然是描写北平、上海之类的大都市与地方、乡村的距离,描写知识阶级与农民、小市民的隔膜,知识阶级却是将其作为建设国民国家的、具有原型性质的故事来解释的。中华民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共产党又将《故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神话性作品来阅读。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故乡》都是叙述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小说。

本书的写作是为了考察《故乡》这一在20世纪的中国被不断重构的文本被阅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种描述七十年间以《故乡》为坐标的国家意识形态框架的尝试。换言之,这里讲述的是一个映现在《故乡》这一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故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国家(nation)定义为“作为影像被心灵世界描绘出来的想象性的政治共同体”,并论述道:“无论是多么小的国家的国民,尽管作为构成这个国家的一员他们与其大多数同胞互不了解、未曾谋面或者互不关心,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映现着共享圣餐的影像。”

---

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白石隆、白石地合译。リブロポト1987年版。

进而,安德森把民族主义与出版资本主义的关系归结为三点:

第一,[略]被出版联系在一起的一些读者同胞们,就这样在世俗的、特定的、可视的不可视性之中,制造了被想象为具有国民意义的共同体胚胎。

第二,出版资本主义赋予言语以新的稳定性,这最终对于那种作为主观性国民观念之核心的古老影像被创造出来发挥了作用。[略]

第三,出版资本主义创造出了不同于固有行政俗语的另一种权力语言。出版语一旦出现,若干方言即不可避免地成为与各自的出版语“更加接近”的东西,并将支配出版语的最终形态。

此外安德森还指出:学校这一规范化的教育设施,因升学而离开故乡前往中心都市这一“巡礼之旅”,都赋予[国民]以具有明确范围的想象的现实性。

社会语言学研究者李妍淑在论述日本的“国语”问题时指出:在明治日本作为国民国家自然生成并向殖民帝国发展的时候,国语是在支撑国家之同一性方面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进而,她沿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思路做了如下论述:

同一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虽然互相未曾见过面,亦未曾交谈过,但同样怀有说着“同样的话”的信念。无法用体验逐一确认的言语共有意识自身和政治共同体一样确实是历史的产物。而且,“nation”这一政治共同体与说着“同样的话”的言语共同体这两种想象相重叠、合二为一的时候,由“想象妊娠”而诞生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这个圣婴便鲜明地展现了身姿。

可以说,安德森和李妍淑各自对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被“想象”所创造出来的过程进行了清晰的阐释。那么,出版是怎样与“读者同胞”相“连接”的?出版资本主义是怎样“赋予语言以新的固定性”的?再者,出版资本主义是怎样使特定的方言“支配出版语的最

终形态”的？所谓“语言的共有意识”是怎样传达给“语言共同体成员”的？不能不说，安德森与李妍淑的解剖刀都未能触及应当称作现代共同体想象核心的“秘密仪式”。

安德森曾经指出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出版资本主义社会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故乡》在20年代的中国一经发表即被经典化这一事实已如前所述，对《故乡》被阅读之历史的探讨，正可以成为解读这种共同体想象之“秘密仪式”的“钥匙”。

在日本，《故乡》最早是于1927年（昭和2年）被译为日文。从那以后，作为外国文学作品，获得读者的数量之大异乎寻常。它最早被收入中学国语教科书是在日本战败后恢复独立不久的1953年，教科书是由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学三年级学生所用。此后收录《故乡》的教科书持续增加，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所有的国语教科书都收录了这篇小说。就是说，《故乡》虽然是外国文学作品，却是被日本人作为“国民文学”来对待的。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建立了密切关系，与此同时摩擦也在增加。我希望，对《故乡》——在日本也曾被长期、深入地阅读的《故乡》——的研究，能够在帮助日本人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理解日中关系方面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如果说文学曾经位于“国民国家想象”的核心位置，那么，我相信文学也同样具有促使人们想象日中两国新型国家关系的力量。我愿意将本书作为日中恢复邦交二十五周年小小纪念。

藤井省三

1997年9月29日

[说明]本书引文中由著者省略的部分一律用“[略]”或“[中略]”表示。对

---

这是译者修改过的表示方法。原著的省略方法是引文中固有的省略用九个点(.....)表示，引用者的省略用六个点(.....)表示，阅读时区分起来不方便。——译注

引文中的词语所做的补充、注释置于[ ]中。正文中有关《故乡》资料的注释只注明书后所附《资料索引》中的编号。例如“(七八·二 b)”就是指《资料索引》中1978年2月发表的a、b、c资料中的b。在中国发行的杂志原则上标明出版年月,但也有标明当年期号的。在中国,图书馆的使用方面有许多困难,为使索引体例更具统一性,本应重新进行资料查寻,但未能这样做,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

# 第一章 知识阶级的《故乡》

——中华民国时期(上)

文本的诞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兴读者层  
爱罗先珂的知识阶级批判  
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杂志的机能  
书店网的扩大与《呐喊》的传播

## 一 文本的诞生

——1921 年对契里珂夫作品的翻译

鲁迅创作《故乡》是在他迎来四十周岁的 1921 年 2 月。这个精彩的短篇发表于当年 5 月号的《新青年》杂志。

相隔二十年回到故乡的“我”，看到记忆中美丽的故乡现在已经变成寂寞之地。叙述者“我”自身也处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之中，为了家人即将卖掉老屋带母亲和宏儿去其正在谋生的异地。这次回故乡正是为了永远告别故乡。在“我”面前，闰土和杨二嫂先后出现了。闰土这位童年时代的朋友现在已经由于贫困变得像个木偶人，年轻时代端庄娴淑的“豆腐西施”杨二嫂也变成厚脸皮的中年妇人。“我”与母亲商量之后决定把不用的物品送给闰土，闰土挑了家具什物之后还要灶间的

草灰去作田里的肥料。但在离乡的船中“我”听母亲说，杨二嫂发现草灰中藏有碗碟，并认定是闰土藏的。“我”的寂寞感被引向小说结尾处那段著名的关于“希望”之逻辑的论述：“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以上就是《故乡》的基本情节。

不过，在创作、发表《故乡》的1921年，鲁迅从在日本翻译出版的文库本尺寸的短篇小说集《契里珂夫选集》中转译了《省会》和《连翘》两篇小说。第二年，这两篇小说被收入外国短篇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5月版）。

契里珂夫（1864—1932）是活跃于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1905）的左翼作家。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强烈影响的大正时期的日本，契里珂夫的作品深受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文学青年的喜爱。1920年，关口弥作所译《契里珂夫选集》由东京的新潮社出版发行。在将契里珂夫的作品译为中文的时候，鲁迅参考《契里珂夫选集》中日语译者关口弥作的“译者序”，亲自撰写了《连翘译者附记》，对契里珂夫的生平做了如下简要介绍：“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儿；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间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然后，鲁迅对其作品做了下述评价：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纵不及别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

当鲁迅说契里珂夫“稍缺深沉的思想”、“不及别人的复杂”的时候，他大约是以同为俄国作家的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作为参照物的。鲁迅从1920至1921年，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以第一次革命（1905）后的俄国为舞台、描写社会革命党员及其绝望、复仇与毁灭

---

日本的水库本图书就是口袋书尺寸的图书。——译注